

# 刑事訴訟體制變遷與修復式司法演進 關聯——以智利為例

劉育偉 \*

## 摘要

拉丁美洲刑事司法體系之運作長期受到歐陸國家傳統文化之影響，其刑事訴訟制度係採糾問制度，智利前於 2000 年開始由糾問制換置為對抗制，基於對抗制著重當事人參與之特色，遂開啟該國適用修復式司法之契機；鑑於智利與臺灣均具有相同刑事司法變革背景，早期也歷經適用修復式司法解決爭端不彰之窘境，也同樣有許多試驗性的專案計畫；因此，本文以拉丁美洲之智利修復式司法之實踐輪廓，探討刑事司法程序之變革對於修復制度影響之關聯性。研究發現智利與臺灣，無論在歷史與文化背景、法律與政策支持、社會資源與人力取材及運用、社會認知及接受度，及在司法成果及評估部分，均存有相似之處；同時亦受到刑事司法程序改採對抗制後所伴隨而來之優勢及困境，喚起修復式司法運行模式是否悖離修復式正義最原始的設計初衷之思辨，雖然兩國適用修復機制之歷程、發展及結局未盡完全相同，但仍有這些相似性，均印證表明修復式司法具有「普遍之適應性」特徵，同時也可以配合個別國家之需求及具體實況，進行在地化、親民化、日常化之「個別化」調整及創新，並以多元的面貌呈現及實踐。

**關鍵字：**拉丁美洲、智利、修復式司法、刑事司法、程序

\* 感謝所有審查委員提供寶貴意見，特表謝忱。

## 壹、前言

近代各國逐漸倡導以修復犯罪所帶來的損害、滿足事件當事人的尊嚴與需求、重建受損的社區、社會為特色的修復式司法 (Restorative Justice)，澳洲長期鑽研修復式正義的知名學者 John Braithwaite (2002) 對於修復式正義的定義為「只要受到不公義 (injustice) 事件影響之利害關係人，能有機會說明自己所受到的傷害，以及應如何在一種具治療創傷的修復式價值 (restorative value) 架構內糾正這種傷害，我們就可認為這是一種修復正義程序」<sup>1</sup>，且根據聯合國修復式司法方案手冊 2 版 (Handbook on Restorative Justice Programmes) 內容所描述，對於加害者、被害人及社區而言，修復式司法是一種實踐正義的替代方式，世界各地對於修復式司法的定義或許不同，不過其意涵大多包含<sup>2</sup>：一、聚焦於犯罪行為所造成之損害；二、修復式司法之參與者包括受害者、加害者及在實踐修復過程中之支持者或家庭成員、利益團體與專業人士等；三、由訓

練有素之專業人員協助修復過程；四、雙方透過對話，對事件之發生與後續之處置行動達成共識；五、加害者應為其行為承擔責任，並對受害者或社區做出補償行為，而修復之結果可能不盡相同；六、對受害者提供支持以助其從案件中復原，並協助加害者重新融入社會，避免再犯。相較於懲罰式正義，修復式司法更關注個體需求和情感之人性化特色，受害之當事人與社區成員得藉由修復過程，溝通抒發、緩解痛苦心情，並恢復信任與安全感；除此之外，在犯罪預防方面，修復式司法得幫助加害者認識其行為後果，從而降低再犯可能性，也因為它著重解決、釐清犯罪根本原因，同樣也有助於預防未來犯罪行為；對於司法成本效益角度觀之，修復式司法之不同工作模式基於能夠處理類型多樣之案件，復以傳統司法體系中許多階段均得轉介修復，因此修復式司法可能比傳統司法更能迅速解決糾紛並降低監禁率，有效降低司法成本<sup>3</sup>，此亦呼應了 Braithwaite 前於 1999 年強調若使用修復式司法得當，是降低懲罰之良好策略<sup>4</sup>。

《註 1》Braithwaite, J. (2002), *Restorative Justice and Responsive Regulatio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許春金，《人本犯罪學》(修訂 2 版)，三民書局，2010 年 1 月，頁 427。

《註 2》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UNODC) (2020), *Handbook on Restorative Justice Programmes (Second Edition)*, available at: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justice-and-prison-reform/20-01146\\_Handbook\\_on\\_Restorative\\_Justice\\_Programmes.pdf](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justice-and-prison-reform/20-01146_Handbook_on_Restorative_Justice_Programmes.pdf), last visited: Jul.3, 2025.

《註 3》郭文東、林國明、紀惠容、葉大華、張菊芳、蘇麗瓊、范異綠，〈「修復式司法運作現況與探討」通案性案件調查研究〉(編號：112 司調 0013)，監察院 111 年度通案性案件調查，2023 年 9 月，頁 9。

《註 4》Braithwaite, J. (1999), A Future Where Punishment Is Marginalized: Realistic or Utopia? *UCLA Law Review, School of Law*, 46 (6): 1745-1747.

揆諸拉丁美洲 (Latin America) 長期以來，刑事司法體系之運作均受歐陸國家傳統文化之影響，其刑事訴訟制度係採糾問制度 (Inquisitorial Criminal Procedural System)。而所謂糾問制度 (以下簡稱糾問制)，又稱為糾問訴訟 (Inquisitionsprozess)，即刑事訴訟程序僅有糾問者與被糾問者之兩面關係，由糾問者 (即法官) 承辦所有刑事程序，無分所謂追訴者與審判者，也無原、被告之別外<sup>5</sup>，亦有違法官無罪推定之原則，又鑑於糾問制無法有效定位檢察官與被告之立場，同時被害人亦無法具體接近訴訟進而參與等原因；因此，近年拉丁美洲各國逐漸受到英美法系之影響，開始朝向以當事人兩造公開透明、言詞辯論、武器對等為基礎之對立 (抗) 式之當事人主義 (Adversarial Criminal Justice System，以下簡稱對抗制)<sup>6</sup> 發展，在刑事司法程序過去轉換的二十年間，面臨角色改變最大的衝擊即是刑事法院的法官；其次，在這次程序變革中，修復式司法 (Restorative Justice 【RJ】，由於拉丁美洲修復式正義之實踐，係附屬於刑事司法體系作為刑事案件解決之補充措施，故本文 RJ 以修復式司法稱之) 成功整併了刑事調解 (penal mediation, PM) 及其他非正式解決衝突機制，使其創造更

具發揮效能之空間及機會。基於臺灣的刑事司法體系自 1980 年代以來，亦經歷多次改革，司法院更於 1999 年全國司法改革會議提案修正刑事訴訟法，現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作為本土化刑事程序操作之特色，過程中同樣受到英美法系影響，於 2003 年引進交互詰問制度 (Cross-examination)，逐漸增強當事人權利的保障，更鮮明活化兩造攻防立場；2000 年代初期受到紐西蘭、加拿大等國的經驗影響，也在刑事司法中引入了修復式司法的概念，初期僅限用於青少年犯罪，後及於輕微犯罪及家庭暴力案件，開始進行更為注重治癒與修復的處理，於 2004 年後逐漸以「無規範」方式或計畫性試辦運作，雖有修復外貌但實與傳統調解無異，並隨著 2007 至 2024 年法律漫長的修正，始逐漸賦予其法源依據，並隨著國內、外民間團體 (組織) 之關注增強，拓展其應用領域；是以，結合臺灣上揭歷史沿革，本文以最接近臺灣刑事司法發展及修復式司法演進歷程相似之拉丁美洲的智利 (Chile) 為例，該國除均具有相同之刑事司法變革背景外，早期也是拉丁美洲各國中，除少年事件外，適用修復式司法解決爭端最低的國家，但卻存有許多試驗性的專案計畫進行，在經歷從糾問制度至對抗制的二十

《註 5》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 (8 版)，新學林，2017 年 9 月，頁 50。

《註 6》當事人主義，又或可稱對抗制度、兩造訴訟或當事人訴訟，故本文稱為對抗制，參閱林鈺雄，同《註 5》，頁 77-78。

年過渡期後，可觀察修復式司法在該國實踐上之差異、如何適應過渡期間、在當事人主義的刑事司法體系中如何解決衝突及填補刑事調解之不足<sup>7</sup>；另外，在此期間，也與臺灣同樣面臨規範性法源依據之爭議，智利等拉丁美洲部分國家將刑事調解納入刑事改革進程中的規範中，並引入其他更具社區參與的刑事衝突管理機制，以實現機會原則，賦予檢察官在刑事案件之裁量權力；相較之下，與其他未將修復性機制納入法規範的國家，導致呈現效果高度多樣化之差異。臺灣修復式司法目前尚處於發展中的階段，與智利之適用程度及時間點雖有所落差，但本文仍可藉由智利修復式司法之實踐輪廓，具體探討該制度與刑事司法程序之關聯性，並提供臺灣未來本土化修復式司法運作之省思。

## 貳、刑事司法程序之變遷

### 一、變遷過程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權意識的提升，智利社會對更公平、快速及透明之司法程序的需求日益增強，特別是在 1980 至 1990 年代，該國刑事司法系統開始備受批

評，強調應保障被告的基本權利並改善受害者的參與權；除來自國內社會與政治壓力，20 世紀末，拉丁美洲多國也著手推動刑事司法改革，特別是諸如阿根廷、哥倫比亞等鄰近國家，已經開始採用對抗制並取得一定成效的背景下，智利亦受到區域性潮流的影響，逐步思考刑事司法程序採取對抗制改革之必要性<sup>8</sup>。該國刑事司法程序由糾問主義轉向對抗式當事人主義肇始於 2000 年（臺灣則是 1999 年「全國司法改革會議」決議即有此構想，2003 年刑事訴訟法之修正乃是最具標誌性轉折，透過交互詰問、證據認定與法院職權調整，正式確立當事人進行主義之基本架構，並建立屬於本土化之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附此對照），隨著此次之改革，賦予當事人一造之公訴人即檢察官在法制架構之許可下，擁有在刑事案件之偵查上得為一定之裁量或決定之空間，這同時也象徵為修復機制之運行開啓對話窗口之「機會」，使衝突解決之方式增添了一項選擇機會，使原本掌握於法官不公開而又冗長之案件審理過程，有簡化之可能性。

其次，附隨於此次改革也產生專責機構之改變，即該國成立刑事公共部（Public

《註 7》 Isabel Ximena González Ramírez, I. (2021), Theo Gavrielides Ed, The Transition from an Inquisitorial to an Adversarial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n Opportunity for Restorative Justice in Chile, *Comparative Restorative Justice*,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London, UK, pp.155-179.

《註 8》 Carothers, Thomas (1999), *Aiding Democracy Abroad: The Learning Curve*,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Hammergren, Linn (1998), *The Politics of Justice and Justice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The Peruvian Cas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estview Press.

Ministry)，該機構是該國刑事司法系統中之獨立機構，主要職責是代表國家負責刑事訴訟中的起訴及調查，確保犯罪的偵查與起訴過程符合正當程序，並保障被告及被害者的權利，其功能除主導刑事調查、提起公訴及促進刑事司法系統的透明度及效率等外，在執行及監督替代性措施部分，該部對於特定案件（如輕罪或未成年人犯罪），引入修復式司法機制，促進加害人與受害人間和解，達成非懲罰性的解決方案<sup>9</sup>，透由此種審、檢分離的法庭運行模式，相較於舊版的糾問式審訊大幅節省審限，且使法官更能專注於量刑之比例原則<sup>10</sup>；此外，亦有實證文獻指出案件逮捕率，在新舊程序的轉換上也呈現數據的變化，在舊制案件逮捕率為 14.5%，於新制實施後下降至 4%，如此變化的解釋則在於強調無罪推定原則在「調查後再逮捕」（investigating to arrest）大於「先逮捕再調查」（arresting to investigate）的功效<sup>11</sup>，

其所強調者——刑罰不再是結果，而量刑也不再是刑事司法最重要的指標，其所在乎的是程序品質的公正性<sup>12</sup>。而在此其中，為顧及被告權益，新興角色的崛起——專業律師；為促進武器對等，智利設立「國家公共刑事辯護機構」（Public Criminal Defence），用以管理並提供公共刑事辯護服務，與臺灣公設辯護制度相似，協助弱勢或低收入被告提供免費法律援助<sup>13</sup>；總之，智利從糾問制轉向對抗制的刑事司法系統，確實為其在刑事司法框架中融入修復式司法提供了獨特的機會，此一轉變也體現在案件管理方式，法官、檢察官及律師的角色扮演，與被告及受害者之權益等面向，為參與性、公正性及復原性實踐創造新的途徑。

## 二、過程窒礙

智利在刑事司法系統從糾問制轉向對抗制的改革過程中，並非未面臨挑戰及窒

---

《註 9》Langer, Máximo (2007), Revolution in Latin American Criminal Procedure: Diffusion of Legal Ideas from the Periphery,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55(4): 617-676; Alcántara Sáez, Manuel, and Leticia Heras Gómez (2019), Judicial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at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註 10》Bovino, Alberto (2003), Judicial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The Chilean Example, *Americ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pp. 269-306.

《註 11》Baytelman, A. & Duce, M. (2003), Evaluación De La Procesal Penal: Estado De Una Reforma En Marcha, Repositorio ANID, Producción científica asociada a proyectos y becas financiadas por ANID, available at: [https://pdf.usaid.gov/pdf\\_docs/PNACY349.pdf](https://pdf.usaid.gov/pdf_docs/PNACY349.pdf), p.18, last visited: Nov.17, 2024.

《註 12》Bustos, J. (2007), *Derecho Penal: Parte General*, T.1 2a ed., Santiago: Ediciones Jurídicas de Santiago.

《註 13》Duce, Mauricio & Riego, Cristián (2007), *La Reforma Procesal Penal Chilena: Evaluación y Perspectivas*, Santiago: CEJA.

礙，而這些困難同樣影響改革的推進與效果，茲就變遷過程窒礙，說明如下<sup>14</sup>。

### (一) 文化及制度上之抗拒<sup>15</sup>

該國刑事司法體系存有對傳統法庭角色有根深柢固之印象；換制後，赫然缺乏對於新角色職務之理解及適應，此部現於法官及刑事司法人員「不習慣」的態度認知有關；畢竟在糾問制中，法官負責調查、蒐集證據並為裁判，但在當事人主義下，調查權移由檢察官，法官僅聽訟，負責指揮審理程序與裁判，面對法官及檢察官被要求習慣新的職權角色分工，傳統執法者對此制度變革感到無法適應進而牴觸改革；至於其他法律從業人員長期習慣糾問制運作，轉向對抗制需要接受新型態之辯護及控訴模式，且必須掌握更多辯論技巧及蒞庭準備，造成渠等對於新制之誤解及抵抗。

### (二) 軟硬體資源及公眾社會接受程度不足<sup>16</sup>

推動以當事人對抗制的刑事訴訟程序須具備新的法庭配置、錄音（影）等技

術性基礎設備等資源，公訴人及辯護人需要學習詰問技術、證據法則等蒞庭攻防技巧；但智利司法系統資源有限，一時難以充分支援改革，復以在推行改革之初，對抗制效率未達到預期，案件量無法負荷，致使案件處理延誤，司法資源亦無法公平分配，故而使公眾質疑新制度之有效性，對改革成效之懷疑及對司法體系之不信任產生道德恐慌（moral panics），尤其在對公開審理及修復式司法的功能認識上存有誤解，社會期待嚴刑峻罰而不諒解修復理念，難以接受此類替代性選擇措施，甚至連司法人員本身也為此制之推展打上問號<sup>17</sup>，彼時智利之窘境根本就是現在臺灣情境的翻版。

### (三) 法律框架和政策支持不足<sup>18</sup>

對抗制的運行需要一套完善的法律框架來明確各個機構之權責，並具體規範公訴人與辯護人在庭之權責，同樣修復式司法之實施亦需要明確的法律架構及程序指導，但智利早期法律對整體刑事司法體系之支持及規範有限（後述），且主要資源仍集中於傳統之懲罰及完善對抗性程序

《註 14》*Supra* note 9.

《註 15》Correa Sutil, Jorge (2002), *The Judiciary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Chile: The Dilemmas of Judicial Reform*, *Democracy Studies*, 5(3): 167-192.

《註 16》Duce, Mauricio & Riego, Cristián (2011), *Innovations in the Latin American Justice Syste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3(2): 423-450.

《註 17》Binder, Alberto (2000), *The Adversarial System in Latin America*, *Reforma Judicial en América Latina*, Buenos Aires: Ad-Hoc.

《註 18》*Supra* note 15.

為優先，而非著重修復式司法程序，也導致修復式司法應用範疇及操作基準缺乏明確性。

#### (四) 修復式司法與對抗制的協調問題<sup>19</sup>

基於對抗制強調的是公正公平地公開審判、兩造對立對抗及證據開示；相對修復式司法則注重修復關係，強調原告與被告之整合、滿足受害人需求及社區參與，在刑事案件中如何衡平此兩種迥異之司法目標，特別是在嚴重暴力犯罪中，程序目標之不一致儼然成為挑戰，此其一也。其次，由於修復式司法通常適用於微罪或非暴力案件，該國尚未形成清晰之指導原則確定適合修復之案件類型，致使修復機制於刑事司法體系中之應用場景、情境等適用範圍受限，似難發揮全面功效。

綜上，智利刑事司法政策從糾問制轉進對抗制之改革歷程中，面對文化與制度上之抗拒根深蒂固，這些抗拒既來自於審、檢、辯對職責調整之不適應，也來自於司法文化對集中化及封閉程序的傳統依賴；同時，社會對刑事政策之信任及接受度不足，使改革過程中一度面臨舉步維艱；同樣地，轉型過程推行修復式司法面

臨多重挑戰亦是預料之中，包括法律框架不足、傳統司法文化抗拒、政府支持資源之匱乏、程序協調困難、社會期待程度低落及欠缺評估措施等，在智利後續投入資源的建構歷程中，透由周延法律政策之支持、修復人才之培訓，確立統一的實施基準、適用範圍及評估機制，方始能大幅促進其在對抗制司法體系中之有效應用<sup>20</sup>。

### 參、拉丁美洲修復式司法體系之建構

#### 一、提供「參與」之機會

在對抗式的刑事訴訟程序中，除大幅提供當事人參與法庭活動之「對話」機會（追訴之一方亦可為被害人為喉舌）外，自然使用選擇性解決衝突的替代方式，在拉丁美洲國家也是普遍常見的司法現象，畢竟被告及被害人在參與訴訟過程中，最後刑事處罰之結果對於兩造而言，其公益價值是非常低廉的；因此，尋求以替代性選項解決問題取代刑罰之施加，主打的就是一項「效率」，此做法簡單定義也就是衝突解決之機制，在於尋求當事人之一致合意，以避免將問題直接帶入刑事司法體系之中<sup>21</sup>。雖然有替代性選項之做法得處

《註 19》*Supra* note 9.

《註 20》López, Rodrigo (2004), Criminal Procedure Reform in Chile: A Model for Latin America?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0(1): 111-129.

《註 21》Horvitz, M. I. & López, J. (2002), *Derecho Procesal Penal Chileno*, T.1, Editorial Jurídica de Chile, Santiago, p.50.

理司法機構解決問題之僵化並使之富有彈性，同時也保障訴訟過程當事人權益<sup>22</sup>，但仍飽受「程序私有化」(privatization of the process)之批評<sup>23</sup>，即刑事司法程序應保有其公共利益價值，但對抗制強調兩造對等權益，該公共程序似乎僅為當事人量身而設計而被嘲諷是否已淪為個人之私有程序之疑；然而，無論改革之方向是如何變化，拉丁美洲部分國家對於替代性選項解決衝突之做法，也未有一致性的共識，但在刑事政策之意義，至少是項為刑事司法程序解除紛爭帶來最小干預的「工具」<sup>24</sup>。最關鍵之影響即在於被害人在程序過程中之同意權，會牽動刑事司法衝突解決之可能性，避免於訴訟過程中，被告因微罪而受預防性羈押前，致使產生有正在製造犯罪之影響 (crime-creating effects)，及在衝突中調和當事人之利益<sup>25</sup>，為達到

這些終結訴訟流程之目的，修復機制即在此產生被選擇適用之機會<sup>26</sup>，然在此替代性選項方案之修復機制尚未能稱之為修復式司法，充其量僅能算得上稱呼為修復式協議 (Restorative Agreements, RA)，此可謂拉丁美洲修復式司法之前身，或前置作為；在為修復式協議前，需要檢察官進行前置之正規調查後，確認被告所犯係對公益侵害最小之罪時，方得允許被告及被害人為非正式之任意協商，被告有義務為被害人修復因犯罪所造成之傷害或填補損失。

## 二、修復式協議之功能

除了檢察官擔任上揭修復式協議之催化劑外，一旦該協議達成後，尚須經法院核准同意方生效力，此舉無非係透由法官背書，被告之協議承諾將得以履行，

《註 22》Ramírez Guzmán, M. C. (2012), Justicia Restaurativa desde la Ministerio Público Chileno, en Congreso Internacional de Mediación y Resolución Colaborativa de Conflictos: Un aporte a la Cohesión Social.

《註 23》Daniel W. Van Ness. & Karen Heetderks Strong. (2014). Restoring Justice: An Introduction to Restorative Justice. NY : Routledge.

《註 24》Baratta, A. (2004), Principios de Derecho Penal Mínimo, en *Criminología Y Sistema Penal*, trad.Faira, Julio César, Editorial B de F., Buenos Aires; Gavrielides, T. (2018),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Restorative Justice*, London: Routledge, Editorial Guidelines, Reino Unido.

《註 25》González Ramírez, I. (2018), Chapter21: Is changing lenses possible? The Chilean case study of integrating restorative justice into a hierarchical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en Gavrielides, T.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Restorative Justice*, London: Routledge, Editorial Guidelines, Reino Unido, Páginas, pp.300-335.

《註 26》González Ramírez, I. L & Fuentealba Martínez, M. S. (2013), Mediación penal como mecanismo de justicia restaurativa en Chile, En *Revista Chilena de Derecho y Ciencia Política* (Vol.4, No.3), Temuco, pp.175-210.

也就是將滿足被害人需求之義務轉嫁由被告面對、承擔，並藉由法院監督其實踐<sup>27</sup>。通常完成修復式協議的三條途徑，最多者是以經濟填補損失（占 78%）；其次，為同意於緩刑期間內履行一定義務（占 12%）；最後，則是向被害人正式道歉（10%）<sup>28</sup>，且甚至都會輔以刑事調解（penal mediation），但該階段都只能說明修復式協議是介於法院與檢察機關之間的旋轉門。惟無可抹滅的是，這些選項於今日都是解決紛爭之重要角色，不但整合也同時修復大多數諸如非暴力竊盜、扒竊、普通傷害及隨機毀損等經常性微罪之填補，並且也呈現了修復機制表現於例如志願 / 當事人出於自由意志 / 聽證與通知參與及對話 / 協議事項之保密 / 修復之聚焦等固有原則之特色；但這些做法，仍僅止步於加 / 被害人之兩造，乃不完全之修復式司法，畢竟其忽略了其他協力系統之支持（例如社區），衡平兩造公權力之規範，欠缺以公正第三人為主持修復程序者等項<sup>29</sup>，面

臨著有待補正的挑戰。

### 三、側軌的批判

拉丁美洲之修復機制不同於其他國家係屬於非正式司法體系，就猶如刑事司法體系之調解機制，在操作及分類上亦有區分正式及非正式之運作模式，取決之基準端視其所依據之法規範在定性上並不是非常明朗，也就是當保障人民權益為優先，證明公訴效益之合理性，及達成抑制犯罪之主要目的之同時，尚須搭配附屬於刑事司法程序之修復式司法輔助，透過損害填補解決衝突，並以維持社會和諧、平復社會疑慮、穩定社會恐慌為次要目的；此時之修復機制即猶如刑事調解運行之初一樣飽受「側軌」（side-track）機制之批評，被認為是政府意志之延伸，在訴追犯罪時，藉以不履行規避過度恣意及歧視等差別待遇之責任<sup>30</sup>；故前者著眼於社會功能與實務效果，後者則關注政治責任與正義的實現。

《註 27》 Zarate, M. (2004), Los acuerdos reparatorios, comentarios desde su regulación normative Igunos comentarios a partir de las nociones de reparación y negociación, en *Revista de Derecho y Humanidades*, Universidad de Chile, No.9, Santiago, pp.125-146.

《註 28》 González Ramírez, I., Fuentealba Martínez, M. S., & Malamud Herrera, S. (2015), Positive Psychology as a contribution to rehabilitation in restorative systems: analysis of two cases of penal mediation in Chile, en *Restorative Justice and Positive Psychology*, Editorial Asghate.

《註 29》 *Supra* note 23.

《註 30》 Hartmann, A. (2010), *The Practice of Täter-Opfer-Ausgleich in Germany*, European Best Practices of Restorative Justice Conference Publication, Budapest, p.205.

由此可知，修復式司法被批評為政府迴避追訴責任的政治工具，特別是在涉及國家暴力或人權侵害的情境中，但在某些脈絡下，它亦能發揮平復社會情緒、穩定秩序的功能，其關鍵即在於其定位與制度設計：若修復式司法被視為對形式司法之補充，而非替代制度，並強調事實揭露與責任承擔，其批判與實務成效或可並存，甚至互補。基此，修復式司法被安插於正式司法體系之運作，就必須鎖定在確保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為中心的前提下統一被實踐，也就是說要向所有被告保證，都能被提供相同之協議規格及保障<sup>31</sup>，故紐西蘭犯罪學者 Allison Morris (2003) 即主張修復式司法之實踐，包含應對被告予以一致性地平等處遇，不得與其罪責顯不相當<sup>32</sup>。

但實際上，修復式司法在多數國家往往集中於特定類型案件與特定群體，無法普遍適用於結構性暴力或複雜衝突，造成「正義的選擇性啟動」，皆反映修復式司法難以貫徹平等原則，反而可能在制度上再製造「修復的排除」，此有待透過制度設計與政治意志進行補救與深化。基此，似

可觀察拉丁美洲之修復體制在刑事司法體系所建構之刑罰原則相較，益證屬次要之輔助性質，地位稍處於邊緣；此恰與臺灣相反，我國刑罰最後手段性之限制，表現於刑法謙抑性之思想，拉丁美洲卻是以刑罰為原則，修復式司法之使用為輔助性角色；以此推論，我國修復式司法於衝突事件之適用後，不因踐行修復式司法而阻卻罪責，蓋本於刑之量定，乃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即便已踐行修復，均無礙於量刑因子之變更（最高法院 113 年度台上字第 4339 號判決意旨參照），亦非為促成被告之量刑利益（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上字第 266 號判決意旨參照），也就是我國修復式司法之實踐對於刑罰而言，只不過是量刑衡酌因子之一，即代表是一種謙抑性的展現；相對地，以智利等拉丁美洲國家，則是仍以刑罰之懲罰為原則，則意謂修復機制實踐之時間點，強調置於矯治，也就是刑罰「執行」階段為其重點，此凸顯在轉型為當事人主義過程中之不適應，也代表修復式司法與

《註 31》 Fellegi, B. (2010), *The restorative approach in practice: Models in Europe and in Hungary*, Budapest, European Best Practices of Restorative Justice Conference Publication, Hungria, p.51.

《註 32》 Morris 在修復式司法領域是一位重要的學者，在修復式司法及青少年司法領域有著深厚的研究背景，伊特別關注修復式司法如何應用於青少年犯罪及社區矯正，強調修復式司法應在犯罪者、受害者與社區之間建立對話及和解，以促進彼此之間之瞭解及修復關係。Morris, A. (2003), *Critiquing the Critics: a Brief Response to Critics of Restorative Justice*, en Johnstone G. (ed), *A Restorative Justice Reader*, Willan Publishing, p.469.

正式刑事司法程序間，在刑罰之適用中儘量尋求修復之最佳平衡點<sup>33</sup>。

#### 四、混淆不清的定位

拉丁美洲刑事調解制度（PM）在其刑事司法程序占有一席之地，其雖與修復式司法均為刑罰之替代性選項，但在智利，基於修復之適用順序最後性，也呈現與刑事調解適用之混淆，例如修復協議（RA）常被安插於刑事調解程序之中，致使此時之修復協議，究竟是居於修復之對話？抑或是調解之協商？再加上無論係修復或調解，都是在當事人合意、志願參與、滿足填補損害之需求，及公正第三人主持等正當法律程序之前提下完成，甚難區辨兩者間之差異<sup>34</sup>。然而，即便有諸多雷同之處，關於修復式司法在解決衝突之效果上仍有刑事調解所不及之處，即：修復社會關係；畢竟這是刑罰調解，在僅強調當事人兩造所無法做到的，也是兩者最大不同之關鍵。此外，調解最重要的操作優點，

同時亦是其缺點，其與修復式司法不同之處，美其名在於過度提升及保障被害人之利益，事實上就是偏頗被害人<sup>35</sup>，此亦即是刑事司法體制轉換為對抗制之初，在適應之過渡期間對被害人的一種替代補償，而且這種利益是基於被加害人侵害所產生，並在伊所能負荷之範圍內，而僅限於身心、物質或經濟損失之利益填補<sup>36</sup>，其中尤其是心理之傷害涉及犯罪被害恐懼，可能會導致後續修復機制於開啓對話及溝通之障礙，且影響當事人參與修復之意願<sup>37</sup>。因此，智利應如何以最低成本，調和該兩種刑罰替代機制，並取得最有利於當事人及社會之衡平（public perception of justice），有賴於更佳的司法公開洞察力提出評價判斷<sup>38</sup>。

#### 五、法規範爭議

有關智利修復機制執行之策略，與我國同樣面臨相同重大的挑戰，即是如何

《註 33》 Blad, J. (2003), Community mediation, criminal justice and restorative justice: Rearranging the Institutions of Law, en Walgrave L., ed. *Repositioning Restorative Justice*, Willan Publishing, Portland, p.196.

《註 34》 Mera-Ballesteros, Alejandra (2009), Justicia Restaurativa y proceso penal garantías procesales: límites y posibilidades, en Revista *Ius et Praxis*, Universidad de Talca, Año. 15, Nro.2, pp.165-195.

《註 35》 González Ramírez, I. (2019), Los Alcances de Regular Normativamente la Mediación Penal en Chile, en *Pensamiento Jurídico Central*, Tirant Lo Blanch, pp.119-153.

《註 36》 Eiras Nordenstahl, U. C. (2005), *Mediación Penal: de la Práctica a la Teoría*, Librería Editorial Histórica, Emillo J. Perrot, Buenos Aires.

《註 37》 Pavlich, G. (2005), *Governing Paradoxes of Restorative Justice*, Glas House Press, p.27.

《註 38》 Public Veliz, C. (2012), Justicia Restaurativa desde la óptica de la Defensoría Penal Pública, en Congreso Internacional, *Mediación Colaborativa de conflictos: Un aporte a la Cohesión Social*, Santiago.

擴大社區的踴躍參與問題，因為社區之參與直接關乎被告所屬生活環境及人際關係之監控，是該制最簡單而又便利之方式，特別是對青少年修復效果尤為顯著<sup>39</sup>。另一項同樣也是拉丁美洲在修復之運作上無法跨越之門檻，即沒有一套基準可決定何種衝突之類型可進行修復，不同於南亞諸國無一不可修復，對於拉丁美洲國家而言，如何跨越「適合」或「不適合」修復的那條界線，是項選擇鴻溝；即便進入適合修復之範圍後，對於主持修復程序促進員適格與否之篩選條件，則又是一項嚴峻考驗<sup>40</sup>。

其次，智利 1930 年頒布刑事訴訟法後，基於 1990 年結束軍政府統治開始民主化進程，同時也受到拉丁美洲鄰近國家如阿根廷、哥倫比亞之影響，於 1994 年於國會成立刑事程序改革委員會並訂定改革計畫，1997 年通過新法改採對抗制，自 2000 至 2005 年採漸進式推展於全國<sup>41</sup>，其刑事訴訟制度變革被視為拉丁美洲司法改革之典範，具有推進透明、高效公平之跨時代重要意義；但即便迄今為止，智利及其他拉丁美洲國家均未將修復式司

法納列於其中，更未見其他任何刑事司法法典（Criminal Justice Code）現其蹤影<sup>42</sup>。究其原因，係由於這些修復機制均屬於非正式司法體系之一環，並藉由不穩定之運作系統進行普遍性地應用；另一方面，這些修復之成功率，往往也基於欠缺公共機構政策性之支持而低落，致使在刑事司法體制內，解決衝突的過程中，普遍難以被說服及接受；因此，即有批評者認為，應將修復機制與調解適用之案件類型予以分類，並劃分彼此基準以決定適用之範圍，同時建議應安置於「刑事司法法典『以外』」體系之強制性法律之中，使該非正式司法作為成為準司法之一部（具衝突解決之同質性及司法之近似性），並得自成一體系而運作（例如加拿大原住民 RJ 即是），目前拉丁美洲除智利外，尚有墨西哥、厄瓜多、委內瑞拉、多明尼加等國，均已朝此方向發展<sup>43</sup>。嗣後，在拉丁美洲又開始面臨程序性之法制革新，另形構此種與刑事司法體系呈平行性發展而獨立運作之體系，稱之為「替代性爭端解決體系」（Alternative Controversy Resolution Systems, ACRS）崛起，進而整合刑事調

《註 39》*Supra* note 25.

《註 40》*Supra* note 36.

《註 41》Ministerio de Justicia y Fiscalía Nacional, available at: [http://www.fiscaliadechile.cl/Fiscalia/fiscalias\\_nacional/informacion.jsp](http://www.fiscaliadechile.cl/Fiscalia/fiscalias_nacional/informacion.jsp), last visited: Nov.28, 2024.

《註 42》González Ramírez, I. (2017), La Mediación Penal y su Desarrollo Normativo, en *Justicia Restaurativa: Herramientas para el cambio desde la gestión del conflicto*, Tirant Lo Blanch, pp.60-106.

《註 43》*Supra* note 7, p.171.

解、仲裁、修復式司法等替代性選擇解決爭端之機制於該體系之中，該體系也紛紛受到拉丁美洲各國賦予其憲法「人權」上之地位，例如智利雖非直接訂明於憲法本文，但仍然係藉由國家人權與和解委員會（1990）（即 Retting 報告）、國家拘禁及酷刑委員會（2003 年）（即 Valech 報告）、經由國會立法通過對於受害者及其家屬提供經濟賠償或其他福利之法律 19.123（1992）<sup>44</sup>、法律 19.980（2004）<sup>45</sup>、並藉由法律 20.405（2009）<sup>46</sup> 成立國家人權機構，一系列沿革過程係由受害者個人補償（如金

錢撫恤）延伸至制度性與文化性層次<sup>47</sup>，並標示著智利修復式司法已有轉型正義的概念，走入的「不只是補償，更是記憶與認同的修復」階段，涵蓋歷史教育、記憶建構與制度保障，並輔以國際人權條約的影響，奠定智利修復式司法之法律基礎，也就是從人權保障之角度賦予修復式司法之法源，間接也成為正式司法體系所承認之合作夥伴<sup>48</sup>。

綜上，關於修復機制於法規層面之實踐，其並非始終依附於刑事司法體系，也未現於刑事法典，而係獨立自成一體系

《註 44》法律 19.123（1992）其中第 2 條即以道德補償（reparación del daño moral）為核心，規定國家所成立之賠償機構（National Reparation Corporation）必須為受害者家屬提供社會及法律協助，同時協助追查失蹤者或受害者所在地及死亡真相，並賦予收集、保存及系統化資料的責任；另該法案第二章設有被害人之每月月撫卹（養老）經費發給之社會福利制度，與修復式司法內涵相關者為道德與情感之補償、法律及社會支持、調查與真相探求及公開與制度透明等項，參閱 <https://www.bcn.cl/leychile/navegar?idNorma=30490&utm>，最後瀏覽日期：2025 年 7 月 3 日。

《註 45》法律 19.980（2004）此係法律 19.123（1992）之延伸並擴張適用對象至被害人子女（特別是弱勢家庭）；對於受害者家屬在原有法律 19.980（2004）之賠償基礎下，引入另一筆恩給制撫卹（第 2 條），透過增強經濟補償、擴大受益群體及制度細緻化的表現，強化修復目標與機制性作用，參閱 <https://www.bcn.cl/leychile/navegar?idNorma=232231&utm>，最後瀏覽日期：2025 年 7 月 3 日。

《註 46》法律 20.405（2009）特別著重在記憶保存、制度性修復與人權賠償機制方面，例如第 2 條即是將修復機制推向人權保障位階的表現；第 3 條規範保存歷史記憶並落實受害者修復式需求；第 14 條設立「國家人權獎」，此項制度象徵性肯定人權工作者，也是修復式司法中之象徵性補償與文化修復措施，與修復式司法內涵相關者為由「人」提升至「制度與文化」之修復、建構制度性記憶庫，確保受害者不被遺忘之尊重並推動象徵性修復，參閱 <https://www.bcn.cl/leychile/navegar?idNorma=1008867&utm>，最後瀏覽日期：2025 年 7 月 3 日。

《註 47》此已於加拿大「四環（圈）模式」（Four Circles Model）之文化圈（Natural Circle）之修復（強調精神層面的修復）有所呼應，參閱 Griffiths, C. T. (1996), Sanctioning and healing: Restorative justice in Canadian aboriginal commun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Applied Criminal Justice*, 20(2): pp.195-208; 劉育偉，〈加拿大修復式正義實踐經驗對臺灣之啟發——以社區參與為中心〉，《法學叢刊》，第 278 期，2025 年 4 月，頁 93-94。

《註 48》Díaz, Luis, M. (2009), ¿Artículo 17 de la Constitución como opción al orden jurídico? *Anuario México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Vol.9, México.

運行，並由拉丁美洲各國於憲法人權保障的層次賦予其更高位階之法源依據，使該非正式司法體系足已達與正式刑事司法體系平起平坐之地位；此種機制濺起之漣漪，後來也影響諸如歐洲部分國家（已持續逾十五年以上之實踐經驗）、澳洲（在1998年適用於未成年事件，2000年開始用於成人案件）、比利時（是世界上少數國家將修復式司法用於所有案件之處理，並在所有刑事程序中皆有其發揮之舞台）、加拿大（與紐西蘭同樣都是修復式正義早期的開拓者）、德國（將修復式正義法制化發揮至淋漓盡致的國家）；時至今日，拉丁美洲之修復式司法已進展可適用於無被害者犯罪，而活躍於毒品法庭（Drug Treatment Courts）運作之工作模式<sup>49</sup>。

## 肆、智利與臺灣修復式司法之比較

揆諸臺灣刑事司法體系結構，也在過去數十年中經歷改革與轉型，特別是近年在刑事司法領域，開始實踐修復式司法。從法務部（2025）官方資料顯示，臺灣修復式司法自開辦迄2025年4月底止，各地檢署總計收案3,020件，進入修復件數2,556件，進入對話程序的有1,456件，進入對話後雙方達成協議的件數為1,031

件，占70.81%；被害人與加害人的感受部分，對被害人而言，結案並已達成協議後，認為「協議履行結果與期望一致」者占76%，加害人部分亦占80%，且74%的被害人認為「感覺正義已經實現」，93%的加害人同意「會全力避免此類事件再次發生」，同時無論是被害人或加害人均會推薦其他人參加對話方案，分別占76%及85%<sup>50</sup>，而智利從糾問制到對抗制刑事司法系統的轉變，提供了一個難能可貴的「機會」來引進修復式司法，畢竟修復機制與對抗制體系，均對於參與、權利及復原之重視相互契合一致，俾使智利之法律框架能夠在滿足司法及治癒雙重需求的同時，實現刑事司法更全面之轉變。因此，本文之所以將智利作為拉丁美洲代表，係因智利刑事司法程序變遷過程、修復式司法適用歷程，均與我國極為相近；但發展迄今，將智利修復式司法經驗與臺灣現況進行比較，不難發現部分有趣的相似之處與差異，茲探討如下：

### 一、體制背景上之比較

智利等許多拉丁美洲國家在刑事司法改革之過渡中，特別是轉型為對抗制司法系統時，逐步引入修復式司法作為刑事衝突處理的替代機制，其中部分有些國家係

《註49》*Supra* note 7, p.173.

《註50》法務部，〈修復式司法 / 績效 & 研究 / 執行績效〉，<https://www.moj.gov.tw/2204/2205/2323/2354/2388/2402/2403/9081/post>，最後瀏覽日期：2025年7月3日。

以調解 (PM) 呈現修復機能致無法區隔何謂是調解，何者為修復式司法執行效能，故無法具體評估究係何者成效？這種「亂中有序」的現象與臺灣目前司法現況相仿，也成為智利刑事司法體制上之特色，但渠等勇於逸脫刑事法束縛，將其納入單獨的法律框架或提升至憲法人權保障位階乙節，則似較我國先進；其藉由通過訂定規範，讓修復式司法得到實質發展，並且提升受害者、加害者及社區之參與機會，就改革結果而言，也是相對正面的。其次，智利在耗費刑事司法系統之置換過程採漸進方式長達二十餘年，相較臺灣刑事司法自 1980 年代以來迄今仍然持續改革，尤其也是在轉向對抗制的過程中，逐漸增強司法的公開性、透明度及當事人權利的保障(例如 2023 年實行之國民法官制度)，朝向公義社會發展，但在修復式司法的實踐上似未若智利等拉丁美洲諸國進步，目前適用範圍仍囿限於部分選擇性案件，並更為注重治癒及復原之處理。

## 二、轉換體制後彼此差異

刑事司法系統，本質上就是一種「輸送痛苦」之系統，無論臺灣或智利均歷經對抗制之轉換，無怪乎程序本身就是一種

懲罰 (the process is the punishment)<sup>51</sup>，但兩者都只顧著刑事司法體制 (Criminal Justice) 之改革，而罔顧社會正義系統 (Social Justice) 之轉變，只強調司法安置而不及社福安置<sup>52</sup>，畢竟社會正義體系之網絡即包含非正式司法體系，也就是在政府資源分配的程度正式司法系統大於非正式；然而，智利等拉丁美洲諸國之正式司法體系事實上未若我國理想 (尤其是其刑事偵審流程及刑事執行政策倉儲化管理部分)<sup>53</sup>；但反觀非正式司法體系使其允許獨立運作之做法，相較臺灣成熟，值得我國效法建構一套本土化「修復式司法體系」運行之參考。

## 三、社區參與實踐上之不同

拉丁美洲諸如智利、哥倫比亞及阿根廷等國修復式司法之規範化已臻成熟，從法制化之角度以觀，對於臺灣早期實踐修復式司法於法無據而言，已取得相對性之成功，渠等修復機制不僅在刑事案件中提供替代方案，尚強調社區參與、被害者之賠償及「恢復原狀」過程，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已能紓解刑事司法之壓力，併能提升公眾對司法的滿意度乙節，即已達成間接修復社群之功能；至臺灣修復式司法

《註 51》Malcolm M. Feeley 著，魏曉娜譯，《程序即是懲罰——基層刑事法院的案件處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4 年 2 月，頁 139-145。

《註 52》許華孚、劉育偉，《北歐犯罪學趨勢及其刑事政策》，一品文化，2018 年 3 月，頁 8-9、11。

《註 53》劉育偉，《刑事政策與獄政發展——變遷比較及思辨》，一品文化，2022 年 11 月，頁 45-49。

雖局限特定領域案件之適用，近年甚至為當前主流——社區化刑事政策之一環<sup>54</sup>，但該制與智利等拉丁美洲國家同樣於國內飽受「側軌」之譏，目前仍停滯於依賴民間法人機構促進修復之操作並欠缺三方主動之自願參與，也缺乏全國性民眾或社群全面性之支持，尚未達具備修復社區之能力。

#### 四、被害人訴訟、修復參與之差異

基於糾問制係以法院主導，並無當事人概念，遑論被害人之參與，其目的係為確保國家權力對犯罪行為進行處罰及控制，故相當注重國家權力，因此智利從糾問制轉換為對抗制後，曾一度於訴訟過程中拉抬被害人參與權利，甚至於程序中刻意偏頗被害人詳如前述。這是對糾問制長期漠視被害人參與權利上之一種制度性報復，也是被害人團體爭取權益後的一種反噬結果，同樣的情狀亦顯於刑事調解及修復式司法被害人參與程度之表現，從演進的過程以觀，智利甫對於犯罪被害人之參與及權利之行使，起步時可謂過度保障，相較於被告，實乃係「患不均」而非「患不足」；相較於臺灣，我國「補丁式」刑事訴訟法遲於 2020 年 1 月始公布施行第七編之三「被害人訴訟參與」，將原本審判中訴訟之三面關係（法院、檢察官及被告），

藉由被害人訴訟參與制度之法制設計，在此三面關係下，為被害人設計一程序參與人之「主體」地位，使其得藉由參與程序，瞭解訴訟之經過情形及維護其人性尊嚴，至關於得聲請訴訟參與之案件類型，考量上開被害人訴訟參與制度之目的及司法資源之合理有效利用，自以侵害被害人生命、身體、自由及性自主等影響人性尊嚴至鉅之案件為宜（刑事訴訟法第 455 條之 38 立法理由參照），但遺憾的是，仍未能將被害人直接提升為當事人地位，且仍有「檢察官提起公訴後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及「聲請參與」上之條件限制。

另，復於同次修正中，亦在該法第 248 條之 2 及第 271 條之 4 規定，檢察官於偵查中，或法院於審判中，皆可依被告及被害人之聲請，將案件「轉介」適當機關、機構或團體進行修復，其前提須以被告與被害人雙方共同聲請，不得逕依職權轉介，並於渠等條文中賦予刑事訴訟程序有關修復機制之法源依據；其程序在審判中，限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提出，法院並應聽取檢察官、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並於轉介後，接受轉介者依評估結果，如認為不適合進行修復時，自當移回檢察官續為偵查或移回法院進行審判；如認為適合修復者，俟其修復結果提出書面報告，送請檢察官供終結偵查

《註 54》劉育偉，〈檢視修復式正義工作模式對刑事政策之影響——兼論社區化刑事政策的思考〉，《軍法專刊》，第 69 卷，第 4 期，2023 年 9 月，頁 71。

之參考，由檢察官憑以抉擇可否為職權不起訴、緩起訴處分，或建議法院從輕量刑或宣告緩刑；審判中案件則送請法院供量刑或是否宣告緩刑之參考，此應用亦是仿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155a 規定檢方（Staatsanwaltschaft）及院方（Gericht）均應審酌加害人（Täter）與被害人（Opfer）間彼此調和（Ausgleich）之可能性，但不得與被害人明示之意思相反<sup>55</sup>；雖然前者有關「被害人訴訟參與」是在刑事訴訟程序中賦予被害人主體地位以及訴訟程序上諸多權利；修復機制則是在法庭外進行被害人與被告的關係修復，性質有異，但兩者在促進「對話」之溝通、相互瞭解之功能、機會卻是一致的，但從上揭規定，對於被害人訴訟、修復之參與仍有囿於國外立法例、時限、轉介、裁量範圍等附條件之限制，而非如智利開放，故我國關於被害人參與之權利保障沿革過程似與智利相反，起步上容有稍嫌遲緩之疑。

## 五、社會認知及公眾支持程度之比較

修復機制係以緩解刑事司法體系壓力為重點，惟參與者難以理解或接納，而受社會群眾普遍認為此係國家公權力機構在面對公民安全問題時之失能及失職，未能有效率地解決衝突。由於智利社會階層分化與經濟不平等問題嚴重，加劇影響修

復式司法於不同社群間是否得以公平實施之意願及機會，復以貧困或下階層文化群體可能缺乏足夠法律支持、教育宣導或獲取資訊之不足，致使無法全面參與修復式司法程序之遺憾；在臺灣與智利相似，也有城鄉資源分配不均、貧富差距之社會問題，社會公民對修復式司法制度、運作、程序及效果之認知仍然有限進而排斥，以偏頗眼光造就群眾對此制之誤解或抵制，再加上受到政治呼應民粹氛圍影響，政府挹注對此之教育資源及宣傳經費有限，基於認知不足致獲得基層社區、偏鄉及弱勢族群支持未彰。

## 六、面臨之挑戰與阻力程度接近

智利早期在未完全規範修復式司法機制前，與臺灣同樣均為試驗性的計畫，或以非正式解決方案運作（例如智利將該制應用於特定刑事案件或青少年犯罪，以測試其效果；臺灣則於少年事件或校園衝突中推行修復試驗，積累實踐經驗），且存在快速、表面化的談判情況，導致該制脫離原本設計目標，三方參與度不足，為其效果大打折扣；此外，由於兩國刑事司法體制均係傳統糾問制司法模式所轉換，社會以「刑罰為正義」的觀念根深柢固，強調偏向責任制之懲罰及報復，而非治癒及重建；修復式司法重視對話、和解及恢

《註 55》朱石炎，〈被害人訴訟參與新制概要——附述「修復式司法」(下)〉，《司法周刊》，第 1987 期，2020 年 1 月 17 日，頁 3。

復，與傳統司法文化本質上即存在一定的衝突，故對這些新興機制之接納程度不一，也加劇修復式司法推動上之難度，可謂是修復式司法相較於傳統刑事司法既存之「原罪」。尤其兩國也均曾歷經威權統治之歷史影響，社會傷痕與分裂依然明顯，如何達到修復社區，進而社會，擴而國家，滿足其正義需求也存在著爭議，特別是在社會治安敏感時期或重大矚目事件發生之際，社群更傾向支持的是嚴刑峻法，而非修復性措施，此亦即臺灣修復式司法所面臨文化制度抵制之挑戰，畢竟在傳統司法體系仍強調懲罰性及效率之前提下，修復觀念仍然相對較新，甚至連法官、檢察官及法律從業人員之認知亦需要逐步改變，而鑑於智利司法體系內部改革進展緩慢，傳統司法與修復式司法之銜接亦不足完善，兩國應如何與傳統刑事司法程序真正融合，也是未來有待持續耕耘之處。

綜上可知，智利等拉丁美洲國家之經驗確實提供了一些寶貴教訓，表明修復式司法若能與現行司法體系結合，並獲得適當之法律支持及運作規範，將能更好地發揮其效果，特別是在減少司法負擔及提高受害者滿意度方面。臺灣未來的發展則需要更深層的制度改革，除提升推動修復式司法之法律規範化，尚須加強對司法人員之培訓及公民法治教育，藉以提高社會群眾對此一新興模式之接納及信任。總體以觀，臺灣及智利之修復式司法在推動過程中面臨相似之挑戰，但也能從彼此之經驗中獲得啓示，尤其是在如何規範、如何培

訓司法人員及如何提高社會接受度方面，透由智利、墨西哥等拉丁美洲諸國印證，對於渠等修復機制通過法規範，甚至獲得憲法審查肯定者，其發展後勢及社會公民接受程度均普遍較高，參與者對司法之整體認知也更為積極；相較之下，未完全規範此類機制的國家中，通常在僅發展出替代方案或試驗性計畫之運作，過程中僅限於公訴人與辯護人間之快速且表面化之談判，簡化或簡易審判後即告消失而未使用參與式的修復方法，故而未能實現制度設計中參與之目標及質量。

## 伍、結論

### 一、比較修復式司法具普遍適應性及個別化之特質

在進行上揭臺灣與智利修復式司法之比較後，研究發現在歷史與文化背景上，臺灣的挑戰更多陷於現代司法文化與傳統價值之矛盾，而智利則受到過去政治壓迫及社會分裂的深遠影響而導致修復式司法在推展進度上之差異；在法律與政策支持上，兩國似乎均缺乏完善的法律基礎及政府、政治對該刑事政策之支持，但臺灣的挑戰更多來自於法律設計初期的不足，而智利的挑戰則與刑事司法體系改革之進展緩慢有關；在社會資源與人力取材及運用上，臺灣的資源挑戰主要集中於修復促進者人力、培訓及普遍性之不足及城鄉地區之差異，而智利的挑戰更多則是與貧富不均有關之經濟不平等及司法資源分配不

均有關；在社會認知及接受度上，兩國同樣均面臨社會認知不足之挑戰，社會認知不足直接影響社區參與之意願，甚至無法達成社會修復之目標，惟臺灣主要是推廣（宣導）度不足、理念普及性之問題，而智利則須克服歷史所遺留之信任危機；末以，在司法成果及評估部分，兩國均面臨評估成效之挑戰，但智利的挑戰更集中於政治與歷史案件之高度敏感性，而臺灣也有並非所有案件均適用而膠著於選擇性修復之桎梏。因此，臺灣及智利在修復式司法之挑戰及阻力上也有相似之共同點，但也展現各自之特定背景差異，有效地結合各自法律、文化及資源特徵，量身定制本土化之修復政策，或許儘管面臨不同的文化及社會背景，但在需求背景、推行模式、資源限制等方面所展現之共同特質，這些相似性均表明修復式司法具有「普遍之適應性」特徵，同時也可以配合個別國家之需求及具體實況，進行在地化、親民化、日常化之「個別化」調整及創新，以多元異樣的面貌呈現及實踐。

## 二、刑事司法改採對抗制後所攜來之優勢及困境

智利刑事司法程序之改革，從糾問制置換為對抗制，共計歷經約二十餘年，其中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觀念下，讓被害人有「參與」之「機會」（因為 2015 年

智利犯罪被害人參與所有聽證之比率只有 4.58%）<sup>56</sup>，強調的是滿足當事人「需求」等項，為修復式司法帶來適用之契機，也是在轉換為對抗制後，最大之附加價值，更為修復式司法在智利等拉丁美洲之茁壯，奠定穩固之發展基礎；但也由於對抗制之轉變，造就智利刑事公共部（Public Ministry），以主導刑事偵查、提起公訴、保護受害者及證人確保渠等於偵審過程中免受威脅或傷害及擔任司法機關跨部協力之要角為其職責，其建置無非係為引入更多對抗性訴訟元素，使檢察機構在刑事司法中發揮更為主動的作用，致使為提升公訴人長期薄弱之訴追能力，設計賦予檢察官強大之裁量權，進而衍生日後檢察官權力之肥大症；其次，混摻於智利等拉丁美洲之調解（PM），與修復式司法之實踐上，實無法進行明顯而有效之區別或辨識，此亦為革新過程中造成不利於修復式司法成長之環境，致其難以擴大適用範圍，進而囿限其發展的原因之一。

## 三、悖離修復式正義最原始的設計初衷有待思辨

在臺灣，反思我們的刑事司法程序也經歷過如智利同樣的改變，修復式正義與修復式司法名詞之使用即產生法制用語上之爭議<sup>57</sup>，初始發展之窘境亦與智利相似，從對於該制之猶豫、懷疑的過程，逐

《註 56》*Supra* note 49.

《註 57》2023 年 2 月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於第四章增列「修復式司法」（第 44 條至第 49 條），始將透由法制化予以正名，但考諸其立法理由，卻未見其不採用「修復式正義」命名之理由。

漸改變、接受，續而進階法制化；然而，在臺灣似仍有未及於拉丁美洲各國之處，在於我國修復式司法仍僅局限適用於刑事案件，且仍依附於刑事司法體系，無法擺脫專業人士之把持或司法機關之壟斷<sup>58</sup>，並仍維持著案件是由司法機關「轉介」，而非真正未經任一刑事司法體系機構之「轉向」的觀念<sup>59</sup>，悖離修復式正義最原始的設計初衷，而難以獨立自成一軌運作，同時在實踐過程「調解」與修復式司法混用的情形<sup>60</sup>之於智利，也是「五十步笑百步」；另同樣強調「參與」，但忽略社區參與、修復社區之細節，更重要的是，在法源依據地位之賦予上，兩國雖然均處於法律位階，但智利將修復式司法視為人權之

一環，早於實踐之初，即界定為憲法人權保障層次之地位，藉由智利等拉丁美洲諸國修復式司法之借鑑，省思我國修復機制仍有上揭尚待努力之空間，將目前對案件選擇性適用之修復式司法，調整為本土化之「完備」修復式正義，並敞開胸襟接受套用於任何糾紛或衝突案件之解決，至於當事人及社區是否選擇修復機制化解紛爭是一回事，但至少「制度本身」不應被設計排除任何案件皆有適用之可能性，提供渠等多一項選擇之機會。因此，雖然此等認知之改變極為基礎，但同時也是最艱難之起步，更是臺灣未來欲躋身人權先進國家最重要亟待克服之一步。

(作者劉育偉為玄奘大學法律學系暨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註 58》同《註 52》，頁 102、120。

《註 59》刑事訴訟法前於 2020 年 1 月修正公布增訂有關偵查及審判中「轉介」修復式司法之相關程序規定（刑事訴訟法第 248 條之 2 與第 271 條之 4 參照），且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 44 條至第 46 條亦係配合上揭刑事訴訟法之修正採以轉介模式，第 49 條亦規定相關機關辦理修復式司法業務時，準用轉介之做法。

《註 60》實務常見所謂「調解修復化、修復調解化」，即針對少年事件或校園霸凌傷害事件，採「修復及調解並行制」，亦即在調解程序中輸入修復精神，及「修復前置」做法（即修復歷程會議先行，後進入調解程序），此可謂係一種「調解——修復」之混合模式 參閱司法院，〈南投地院研習修復式司法 期於實務操作中有效運用〉，《司法周刊》，第 2146 期，2023 年 3 月 3 日，頁 4。

## 參考文獻

### 一、中文

- 司法院，〈南投地院研習修復式司法 期於實務操作中有效運用〉，《司法周刊》，第 2146 期，2023 年 3 月 3 日。
- 朱石炎，〈被害人訴訟參與新制概要——附述「修復式司法」(下)〉，《司法周刊》，第 1987 期，2020 年 1 月 17 日。
-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8 版），新學林，2017 年 9 月。
- 法務部，〈修復式司法 / 績效 & 研究 / 執行績效〉，<https://www.moj.gov.tw/2204/2205/2323/2354/2388/2402/2403/9081/post>，最後瀏覽日期：2025 年 7 月 3 日。
- 許春金，《人本犯罪學》（修訂 2 版），三民書局，2010 年 1 月。
- 許華孚、劉育偉，《北歐犯罪學趨勢及其刑事政策》，一品文化，2018 年 3 月。
- 郭文東、林國明、紀惠容、葉大華、張菊芳、蘇麗瓊、范異綠，〈「修復式司法運作現況與探討」通案性案件調查研究〉（編號：112 司調 0013），監察院 111 年度通案性案件調查，2023 年 9 月。
- 劉育偉，〈加拿大修復式正義實踐經驗對臺灣之啟發——以社區參與為中心〉，《法學叢刊》，第 278 期，2025 年 4 月，頁 79-116。
- 劉育偉，〈檢視修復式正義工作模式對刑事政策之影響——兼論社區化刑事政策的思考〉，《軍法專刊》，第 69 卷，第 4 期，2023 年 9 月，頁 67-91。
- 劉育偉，《刑事政策與獄政發展——變遷比較及思辨》，一品文化，2022 年 11 月。
- Malcolm M. Feeley 著，魏曉娜譯，《程序即是懲罰——基層刑事法院的案件處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4 年 2 月。

### 二、外文

- Alcántara Sáez, Manuel, & Leticia Heras Gómez (2019), Judicial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at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ratta, A. (2004), Principios de Derecho Penal Mínimo, en *Criminología Sistema Penal*, trad.Faira, Julio César, Editorial B de F., Buenos Aires.
- Baytelman, A. & Duce, M. (2003), Evaluación De La Procesal Penal: Estado De Una

- Reforma En Marcha, Repositorio ANID, Producción científica asociada a proyectos y becas financiadas por ANID, available at: [https://pdf.usaid.gov/pdf\\_docs/PNACY349.pdf](https://pdf.usaid.gov/pdf_docs/PNACY349.pdf), p.18, last visited: Nov.17, 2024.
- Binder, Alberto (2000), *The Adversarial System in Latin America, Reforma Judicial en América Latina*, Buenos Aires: Ad-Hoc.
- Blad, J. (2003), Community mediation, criminal justice and restorative justice: Rearranging the Institutions of Law, en Walgrave L., ed. *Repositioning Restorative Justice*, Willan Publishing, Portland.
- Bovino, Alberto (2003), Judicial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The Chilean Example, *Americ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269-306.
- Braithwaite, J. (1999), A Future Where Punishment Is Marginalized: Realistic or Utopia? *UCLA Law Review, school of Law*, 46 (6): 1727-1750.
- Braithwaite, J. (2002), *Restorative Justice and Responsive Regulatio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ustos, J. (2007), *Derecho Penal: Parte General*, T.1., 2a ed. Santiago: Ediciones Jurídicas de Santiago.
- Carothers, Thomas (1999), *Aiding Democracy Abroad: The Learning Curve*,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 Correa Sutil, Jorge (2002), The Judiciary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Chile: The Dilemmas of Judicial Reform, *Democracy Studies*, 5(3): 167-192.
- Daniel W. Van Ness. & Karen Heetderks Strong. (2014). *Restoring Justice: An Introduction to Restorative Justice*. NY : Routledge.
- Díaz, Luis, M. (2009), ¿Artículo 17 de la Constitución como opción al orden jurídico? *Anuario México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Vol.9, México.
- Duce, Mauricio & Riego, Cristián (2007), *La Reforma Procesal Penal Chilena: Evaluación y Perspectivas*, Santiago: CEJA.
- Duce, Mauricio & Riego, Cristián (2011), Innovations in the Latin American Justice Syste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3(2): 423-450.
- Eiras Nordenstahl, U. C. (2005), *Midiación Penal: de la Práctica a la Teoría*, Librería Editorial Histórica, Emillo J. Perrot, Buenos Aires.

- Fellegi, B. (2010), *The restorative approach in practice: Models in Europe and in Hungary*, Budapest, European Best Practices of Restorative Justice Conference Publication, Hungría.
- Gavrielides, T. (2018),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Restorative Justice*, London: Routledge, Editorial Guidelines, Reino Unido.
- González Ramírez, I. (2017), La Mediación Penal y su Desarrollo Normativo, en *Justicia Restaurativa: Herramientas para el cambio desde la gestión del conflict*, Tirant Lo Blanch, pp.60-106.
- González Ramírez, I. (2018), Chapter 21: Is changing lenses possible? The Chilean case study of integrating restorative justice into a hierarchical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en Gavrielides, T.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Restorative Justice*, London: Routledge, Editorial Guidelines, Reino Unido, Páginas.
- González Ramírez, I. (2019), Los Alcances de Regular Normativamente la Mediación Penal en Chile, en *Pensamiento Jurídico Central*, Tirant Lo Blanch.
- González Ramírez, I., Fuentealba Martínez, M.S., & Malamud Herrera, S. (2015), Positive Psychokogy as a contribution to rehabilitation in restorative systems: analysis of two cases of penal mediation in Chile, en *Restorative Justice and Positive Psychology*, Editorial Asghate.
- González Ramírez, I. & Fuentealba Martínez, M. S. (2013), Mediación penal como mecanismo de justicia restaurativa en Chile, en *Revista Chilena de Derecho y Ciencia Política* (Vol.4, No.3), Temuco, pp.175-210.
- Griffiths, C. T. (1996), Sanctioning and healing: Restorative justice in Canadian aboriginal commun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Applied Criminal Justice*, 20(2): 195-208.
- Hammergren, Linn (1998), *The Politics of Justice and Justice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The Peruvian Cas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estview Press.
- Hartmann, A. (2010), *The Practice of Täter-Opfer-Ausgleich in Germany*, European Best Practices of Restorative Justice Conference Publication, Budapest.
- Horvitz, M. I. & López, J. (2002), *Eerecho Procesal Penal Chileno*, T.1, Editorial Jurídica de Chile, Santiago.

- Isabel Ximena González Ramírez I, X. (2021), Theo Gavrielides Ed, The Transition from an Inquisitorial to an Adversarial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n Opportunity for Restorative Justice in Chile, *Comparative Restorative Justice*,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London, UK.
- Langer, Máximo (2007), Revolution in Latin American Criminal Procedure: Diffusion of Legal Ideas from the Periphery,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55(4): 617-676.
- Ley 19123(1992), <https://www.bcn.cl/leychile/navegar?idNorma=30490&utm>, last visited: Jul.3, 2025.
- Ley 19980 (2004), <https://www.bcn.cl/leychile/navegar?idNorma=232231&utm>, last visited: Jul.3, 2025.
- Ley 20405 (2009), <https://www.bcn.cl/leychile/navegar?idNorma=1008867&utm>., last visited: Jul.3, 2025.
- López, Rodrigo (2004), Criminal Procedure Reform in Chile: A Model for Latin America?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0(1): 111-129.
- Mera-Ballesteros, Alejandra (2009), Justicia Restaurativa y proceso penal garantías procesales: límites y posibilidades, en Revista *Ius et Praxis*, Universidad de Talca, Año. 15, Nro.2, pp.165-195.
- Ministerio de Justicia y Fiscalía Nacional, available at: [http://www.fiscaliadechile.cl/Fiscalia/fiscalias\\_nacional/informacion.jsp](http://www.fiscaliadechile.cl/Fiscalia/fiscalias_nacional/informacion.jsp), last visited: Nov.28, 2024.
- Morris, A. (2003), Critiquing the Critics: a Brief Response to Critics of Restorative Justice, en Johnstone G. (ed), *A Restorative Justice Reader*, Willan Publishing.
- Public Veliz, C. (2012), Justicia Restaurativa desde la óptica de la Defensoría Penal Pública, en Congreso Internacional, Mediación Colaborativa de conflictos: Un aporte a la Cohesión Social, Santiago.
- Pavlich, G. (2005), *Governing Paradoxes of Restorative Justice*, Glas House Press.
- Ramírez Guzmán, M. C. (2012), Justicia Restaurativa desde la Ministerio Público Chileno, en Congreso Internacional de Mediación y Resolución Colaborativa de Conflictos: Un aporte a la Cohesión Social.
-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UNODC) (2020), Handbook on Restorative Justice Programmes (Second Edition), available at: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

justice-and-prison-reform/20-01146\_Handbook\_on\_Restorative\_Justice\_Programmes.pdf, last visited: Jul.3, 2025.

Van Ness, D. W. & Strong, K. H. (2015), *Restoring justice: An introduction to restorative justice*, Ohio.

Zarate, M. (2004), Los acuerdos reparatorios, comentarios desde su regulación normativa algunos comentarios a partir de las nociones de reparación y negociación, en *Revista de Derecho y Humanidades*, Universidad de Chile, No.9, Santiago, pp.125-146.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volution of Criminal Procedure System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storative Justice: A Case Study of Chile

Yu-Wei Liu\*

## Abstract

The operation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n Latin America has long been influenced by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European countries, and its criminal procedure system adopts the Inquisitorial Criminal Procedural System. Chile began converting from the Inquisitorial Criminal Procedural System to the Adversarial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n 2000. Because the Adversarial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focuses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both parties, it opens up opportunities for Chile to apply restorative justice.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both Chile and Taiwan have the same background of criminal justice reform and have experienced the dilemma of in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restorative justice to resolve disputes in their early years, but they also have many experimental projects in operation. Therefore, this article takes Chile, a Latin American country, as an example to get a glimpse of the contours of restorative justice practice in that country. At the same time, exploring the relevance of changes in criminal justice processes for the impact of restorative justice. The study found that Chile and Taiwan have similar in terms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w,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legal and policy support, social resources and manpower selection and utilization, social cognition and acceptance, and judicial achievements and evaluation. In addition, through comparison, we also discovered the advantages and difficulties that come with converting the criminal justice process to the Adversarial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This further arouses our thinking on whether the mode of operation of restorative justice deviates from the original design. Although the process, development and outcome of the application of restorative justice in Taiwan and Chile are not exactly the same. However, the restorative mechanisms of the two countries are still similar, which also means that restorative justic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niversal adaptability”. The restorative mechanisms can also be adapted to the needs of individual countries and specific actual conditions, and can be “individualized” adjustments and innovations that are localized, people-friendly, and daily, and can be presented and practiced in diverse ways.

**Keywords:** Latin America, Chile, Restorative Justice, Criminal Justice, Procedure.